

走向智媒时代的传播学研究： 国际传播学会(ICA)费雪导师奖得主 张国良教授访谈录

张国良¹，孟筱筱²，李耘耕³

摘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传播学引入中国以来，已历时四十余年。智能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传播格局。作为中国传播学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张国良教授在本次访谈中分享了他对智能传播时代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未来走向的见解。访谈从他的个人成长与学科发展轨迹出发，结合其走上传播学之路的经历，回顾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历史沿革。同时，他围绕当前传播学发展面临的困境，总结了四十多年来学科研究的变化和经验，以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心得。访谈还重点讨论了智能技术的影响与传播理论的创新，畅谈了传播学的学科边界、元问题等话题。通过对张国良教授的访谈，本文回望并前瞻了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脉络及其走向智媒时代的可见趋势。

关键词 传播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新闻传播教育；智能传播

DOI 10.26599/GJMS.2024.9330071

一、个人成长与学科发展的轨迹

孟筱筱：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张国良：今年年底，我就 70 岁了，古稀之年了。我最近写了一本回忆录，两年前就开始动笔了，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聊一聊。我于 1976 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留校工作，属于工农兵学员，一开始没有上课，而是让我备课，给我的第一门课是中共党史。那时我所在的复旦新闻系有一个党史教研室，我刚留下来，就被安排在了那个教研室。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但那时，党史与新闻史是混为一谈的，新闻史也就是党的新闻史。1978 年，还有过一个小插曲，就是对以前留校的工农兵学员进行了筛选。这里说明一下，工农兵学员的招生一直持续

1. 张国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2. 孟筱筱：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3. 李耘耕：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国际视点 ·

到 1977 年,大部分没有达到大学的文化程度,但也留了一些人当老师,因此,“文革”结束后,有的学校将这些人统统赶走,有的学校则区别对待,复旦大学就作了甄别。当时,我们留在新闻系的十几名工农兵学员接受了 4 场考试,大约 1/3 被淘汰,留下 2/3,几乎都分给了新闻实务教研室,我因为考试成绩名列榜首,被分到了新闻理论教研室。这就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起点。

李耘耕:您是国内最早接触传播学的重要学者之一,是否可以谈谈当时相继来华开设讲座的内川芳美和施拉姆,谈谈那段经历以及当时中国学者是怎么理解传播学的?您又是与传播学如何结缘的?

张国良:当时我留校当了两年老师,如刚才所说,经过了新闻系的“甄别”考试,我的成绩不错,可以深造,因此,新闻理论教研室要我加入了他们这个以理论研究为主的“龙头”教研室。1978 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办了一本内部杂志,叫《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同年秋天,内川芳美来访,他好像是参加一个代表团,来访问我们学校的日本研究中心,这个代表团里应该有各个学科的人,而新闻传播学背景的内川芳美教授就选择到新闻系来作交流。细节记不清了,但有一个确定的事实是,他的讲稿后来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刊登了,我读了完整的讲稿,对我产生了影响,一是让我知道了日本东京大学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很厉害;二是内川芳美作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所长(有他演讲的照片为证),风度翩翩,打动了我;三是他的演讲内容固然有趣,但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用“大众传播”概念代替了我们惯用的“新闻”概念。

紧接着,1979 年,新闻系的领导为了培养我,把当时的一个出国名额(日本文部省资助)给了我,让我去日本留学,于是,我就选择了东京大学。1981 年我东渡日本,1982 年我回国不久,施拉姆就来访问了。当时有领导告诉我,说有一位很有名的宣伟伯(即施拉姆)第二天要来新闻系讲座,但我并未在意,加上手头有其他事,就没去听,恰如纳兰性德所说“当时只道是寻常”,后来才感受到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从内川芳美访华到施拉姆来华的那几年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已出版了好几期,不久改成《世界新闻事业》,后来又改成了《新闻大学》。1982 年,陈韵昭老师就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传播学的介绍文章。因此,大家对传播学已经有了一些初步了解,与内川芳美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李耘耕:您在日本应该也接触过传播学,日本应是更早受到了美国传播学的影响?

张国良:对,我在日本留学时比较系统地读了传播学的书,对传播学有了大体的了解。因此,施拉姆来的时候,我个人对传播学也没有太新奇的感觉了。

对比内川芳美和施拉姆,前者比后者来得更早,尽管内川芳美的目的不是推广传播学,而是来介绍日本的新闻业或者说大众传播业,但还是间接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让我们了解到国外学者已采用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新闻史,或者说,新闻史研究被包含到大众传播史研究之中。同时,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即施拉姆来华之前,传播学的普及工作已开展了一段时间,大家通过陈韵昭、郑北渭等老师的介绍,已了解传播学的一些基础,而不是对传播学一无所知了。施拉姆更多的是起了推动作用。说他的来访引起了轰动,有点言过其实。当然,新奇感、新鲜感是有的。

李耘耕:当时中国学者是怎么认识传播学的?

张国良:当时的普遍认知和理解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新闻学搞出一个新玩意儿,叫作传播学。但人们认为,这个新玩意儿对中国的新闻学能有一些启示,对改革开放阶段的新闻业能有一些促进作用,因此,值得了解,需要引进。尽管如此,还时不时要加一句:这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要抱着批判的态度。

孟筱筱:您最早是如何在中国大陆开展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

张国良:我于1991年接受了讲授传播学课程的任务后,1995年在讲义基础上主编了一本教材,即《传播学原理》,出版时间算是比较早的,它试图介绍传播学的一些原理,但编得有点匆忙,又是三个人合作,因此,不太完善。我后来一直想进一步提高它,但越来越抽不出时间,因为我于1996年晋升教授之后,1998年又担任了副院长,并作为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于是,修订教材的工作只能暂时搁置,而把重心转向了培养博士生,以及带领他们一起努力让中国的传播学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就是开展规范化、理论化的实证研究。

李耘耕:中国最早的新闻研究人员大部分是中文系出身,没有受过太多的社会科学方法训练,但美国的传播学基本遵循实证范式,当时大家只是知道有这个东西,但对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完全没有了解,也没有实践。您是中国最早开展实证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您当时是怎么有这个意识,并开始实证研究的?

张国良:我不是最早,有更早开始实证研究的人,如复旦新闻系77级的几名学生在1980年就调查了“四人帮”受审信息的流传过程。如你所说,中国的新闻教育最初是在中文系的框架下起步的,大多作为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存在,也有一些报学系、新闻系较早与中文系“分家”,独立出来,但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基础训练是大同小异的,比如采写编评,但之后就分道扬镳了,文学作品是

虚构的,新闻作品是写实的。当然,还有报告文学之类的样式,处于中间地带,又虚又实。不管怎样,新闻学一直属于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学科,因此缺乏社科方法的训练,对社科理论的学习也不多。另外,新闻专业即使脱离中文系而独立成了系,在一段时间里,中文系还是看不起新闻系,认为新闻系是小儿科。我在复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基础写作等课程仍然是请中文系背景的教师来讲授的。

我是在独立的新闻系里接受训练和教育成长起来的,但我对自己一直不太满意。如上面所说,我被分配到了新闻理论教研室,但我觉得,很难做出成绩,越做越难。这种客观的压力让我不得不朝着学术的方向加倍努力。当时,我有两个欠缺,一是学历不够,二是学力也不够,于是,就得深造,攻读硕士。但我没有报考新闻系,而是报考了历史系的研究生。为什么呢?因为我已认识到,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强而学理性弱的应用型学科,既然我决定要提升学力,而非仅仅解决学历问题,自然就应选择一门基础性学科。

后来,我考取了复旦历史系,并获得一个硕博连读机会。1988年至1989年,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完成了联合培养的博士课程。从日本回国后,整个1990年,我都在撰写博士论文,以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为题,到1991年春顺利毕业。毕业之际,我就面对着一个何去何从的关键性选择,是转向历史研究或日本研究?还是继续原来的新闻理论研究?恰好在那个时候,领导来问我,能不能讲授传播学的课程?这也就意味着,我有了一个机会从新闻学转向传播学。命运就在那几天里定了下来,我反复权衡的结论是,从事传播学研究还是很有意思的。真可谓机缘巧合。

那个时候,我翻译了日本学者编写的一本《大众传播社会学》,有一定的影响。领导可能因此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就让我转到了传播学的领域。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可不算是“美差”。因为,当初普及传播学的那波热潮已消退了,不仅如此,在政治局势的冲击下,甚至是极大地受挫了。不久,又兴起了经济大潮的冲击,让传播学跌入了“双重低谷”。顿时,还能在这一“荒野”中坚持探索的人员变得屈指可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慢慢走出低谷。总之,那时的情况是,不要说实证研究,就连整个传播学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只有少数人坚守了下来。对我来说,确实也是一次考验,时不时有人说,你怎么还不走啊?回想起来,坚持下来真不容易。

如前面所说,我不是最早开展实证研究的,除了1980年对“四人帮”受审信息的调查之外,还有1982年的北京调查、1985年的上海市民新闻行为调查等,我自己也与日本学者合作,开展了中日新闻工作者比较研究、中日韩报纸相互报道比较研究等课题。但那些研究的不足是,要么不够规范,要么缺乏理论导向,因此,对兼具规范性、理论性的定量研究的自觉推动,是从我开始的。

孟筱筱：当下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环境与您那个时候的差异和联系是什么？或者说，与40多年前相比，当下实证研究的关注重点和难点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国良：回过头看，20世纪80年代已陆陆续续地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但还缺乏重视学科建设的意识。2000年成立了教育部唯一的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聘请我担任基地主任，由此我又被赋予了带动整个学科建设的责任。

那时，开展理论化的实证研究已具备了条件，观念、队伍、方法都不是问题了。因为是拓荒阶段，尝试把来自西方的传播学经典理论放在中国情境中加以考察、修正，既难——所谓“万事开头难”，同时，也有容易的一面，即当时人们的期望还不是太高。今天的要求就不同了，标准也好，目标也好，都更高了。

多年来，我们对理论的认识往往不够全面。当我们提“西方理论”时，可能有一种潜在的、不正确的意识，把理论分成“你的”“我的”“他的”。所谓的“西方理论”，尽管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狭隘地认为其只属于西方。一个当下不应再有异议的共识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属于全人类的。当然，人文学科的成果也是属于全人类的。这里的差异在于，社会科学探索一般规律，侧重普遍适用性，而人文学科呈现特殊经验，追求文化多样性。

大体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传播学界逐步转向了实证研究范式。所谓“形势比人强”，从实践看，无论是各家期刊论文，还是各校硕博士学位论文，大部分都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需要重申的是，我们引入传播学理论之初，开展验证性研究是不二路径，其目的之一是应用理论，即如果合适，就可以运用于本土实际，造福中国人民；其目的之二则是发展理论，即在前人基础上努力产出新的理论、好的理论。

顺便提一下，总有人说，学术研究不能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要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来，这我很同意。但所谓另外的道路，放眼望去，却也都来自西方，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学、可供性理论等，这反映了一种“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状况吧！

我曾经在《中国传播学的不惑之感》那篇文章里将中国传播学研究分为六种取向或类型：历史的、传统的、思辨的、批判的、业务的、实证的。应无大的遗漏。我认为，这些取向或类型各有各的价值，但无论如何，实证取向的研究，即理论化的实证研究，构成了基石。何谓“基石”？即如果抽取了它，学科就垮掉了。

有必要强调的是，理论化的实证研究与所谓的“精致的平庸”是不相容的。如前面所说，科学研究的目标是应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绝非为实证而实证、为量化而量化，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孟筱筱:有人批评说,中国大陆实证研究做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理论创新,您刚刚谈到精致的平庸,尤其是一些研究使用传统的定量方法,如果模型比较小,就会受到批判,认为这些微观的变量操作没有太大意义,您对此怎么看呢?

张国良:这种批评似是而非。难道非实证研究就有很多创新了吗?迄今为止,中国传播学研究确实没有太多创新,这是普遍现象,也不限于传播学,而是见诸各个学科,见诸采用各种路径和方法的成果,非实证方法之过。我有两个印象,未必准确,但大体不差(希望有学者对此也做一个实证研究):(1)相对而言,实证研究中的理论创新是最多的;(2)少量较为出色的创新性成果也集中在实证研究范式。

当前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端是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不够完善,导致论文生产数量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定量方法相对还比较可取,即多多少少能得到一些发现,就是说,这里有体制的问题,不能全归咎于个人。

虽然一直有人批评实证方法,但它至今依然是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而且,有批评是正常的,这不就是学术争鸣吗?不管怎样,我们至少需要达成一个关于学科性质的共识,即传播学是一门独立的、正在走向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

另外,对教师来说,培养学生要注重培养思想水平、思考能力,论文要有灵魂,就是说,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既能发现问题,又能深入地思考,缜密地设计研究方案,规范地加以实施。不仅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在理论层面有所贡献,唯此,方称得上是合格的实证研究。可见,思辨与实证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对立的。

二、智能技术与传播理论的创新

孟筱筱:当下新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经典传播学理论带来了哪些挑战?

张国良:确实,经典传播学理论遇到了挑战,但我不认为它们会被彻底否定。尽管技术发展很快,但因为基础理论或者说经典理论的产生是基于人的本性,所以,只要人的本性不变,这些理论也不会被根本性地颠覆,当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就是说,在传承旧理论的基础上,会有新理论产生。新媒体或者说互联网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传受合一,传统的大众传播的特点是传受分离,传归传、受归受,而现在是传受合一了,这就需要有新的思考。其实,人在开展自我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时候从来都是传受合一的,只是到了组织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的阶段,传受就越来越分离了,而新媒体让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靠拢或回归,它们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每一个个体都可以通过新媒体向全球社会发布信息,这时,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之间的藩篱就被拆除了,但不能因此认为,原来的理论都不适用了,因为人际传播也好,组织传

播、大众传播也好,这些传播方式或形态依然存在,它们的基本规律也没有变,所以,当下让人眼花缭乱的形势只是意味着时代确实在呼唤理论的迭代更新。那么,原来的理论究竟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目前还难有定论。

孟筱筱: 智能传播将来会不会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学术趋势?

张国良: 智能传播,准确地说应是智能技术在传播中的运用,或者说是运用智能技术产出的传播工具即智能媒体的传播活动。这一技术、工具或媒体的飞速发展确实带来了莫大好处,把人从简单、初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毕竟需要人把数据信息“喂”给智能媒体,它才能运作。所以,至少目前还不能指望 AI 代替我们来进行原创性的工作。我与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有过一些交流,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机器人再怎么聪明,也只是在人类提供的信息和知识之范围内拥有强大的集成能力,而无以产生具有原创性和思想性的东西。

孟筱筱: 那么,计算传播呢?

张国良: 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精确,可望克服以往的一些主观性,比如传统的调查大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但很难说有颠覆性,因为即使在传统时代,研究者对于调查问卷的可靠性也有一定的警觉。另外,大数据也有缺陷,它覆盖不到所有方面,况且,言语不一定代表行为,行为的数据也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意义,行为本身也可能是多义的。因此,最可依靠的唯有学者的思想和智慧。

李耘耕: 传播学一直以来被视为一个交叉学科,那么,在智能技术的冲击下,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是否会变得更模糊呢?

张国良: 我一直都反对传播学过于强调自身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尤其是陷入“领域”或“学科”的无谓之争,两者完全可以相容、没有矛盾啊!我在近期发表的几篇相关论文里阐述得很清楚了:任何学科都有交叉性,只是强弱不同,任何学科也都兼有“学科”“领域”性质,尤其是横向型学科,这个特点更加明显,诸如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切勿以为只有传播学处于“十字路口”,这是一种误解。严格说来,没有什么交叉学科,只有交叉方向,即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向,比如“新闻传播学”就是由新闻学与传播学交叉而成的“新闻传播研究”,属于传播学的一个研究方向或分支(而非独立)学科,可见,此“学”非彼“学”。这里的逻辑至为明白,当我们讨论学科交叉的时候,所谓学科,自然是指独立学科,否则,怎么与其他学科交叉呢?

至于施拉姆说的传播学将成为一个综合学科或构成其他学科的基础,就是

信口一说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传播学的基础性远不及文史哲,也不及心理学、社会学。尽管传播学研究的目标是探索传播现象的一般规律,但它不可能超越历史、文化、思想、社会、心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在很多情况下,传播或媒介的作用是相对表层、次要的,而非深层、主要的,这是传播学的一个局限性。当然,传播学有自己的优势和独特性,可以给其他学科一些启发。以外语学科为例,它一贯重视研究跨文化交流,但对传播的一般规律知之不多,接触传播学之后,才了解到5W模式、二级传播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这还只是大众传播学,如果加上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相关理论和启迪就更多了。

李耘耕:在智能技术的冲击下,传播学是否还有一以贯之的元问题需要解决?

张国良:上次我们在上海交大举办的论坛上聊过这个话题。传播学面对的根本问题是,传播或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反向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引申出许许多多的课题来。

当下的一个偏向是过于放大媒介的作用。有相当多的论文采用这样一种套路:互联网使用对某个方面或人群(比如幸福感、信任度或不同性别、年龄段等)的影响,如果觉得互联网有点不够,就加一些其他变量。但关键是,在你的这个研究中,互联网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尤其需要注意,互联网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媒介,不同于以往任何媒介——它们不仅容量有限,而且总是偏爱某些信息。因此,如果完全不问内容如何而仅仅从接触时间、频率等角度来研究互联网的影响,可能就偏离了实际,可靠性、说服力就不强了。

曾有学生问我,到底怎么判断一个研究题目意义的大小?我说,就看传播因素在其中作用的大小,毕竟不是在所有情境中传播或媒介都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任何题目中,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发现、加入传播学的因素或视角,但有时这个因素、视角是无足轻重的,而你非要研究它,就好比走上了一条小径。这时,有人就只好求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那你就到别人家里去了,又走偏了——当然,如果真能为其他学科作出理论贡献,也有价值,但谈何容易呢?总之,思考、选择研究题目的一个前提是,确定传播或媒介在相关问题、情境中的实际位置。

三、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思考

孟筱筱:您于2024年获得国际传播学会(ICA)费雪导师奖,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学者,也曾获范敬宜新闻教育良师奖和交大佳和优秀导师奖,可否给我们分享一些育人经验?比如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有哪些具体的方法?

张国良：有很多方法。比如，读书的引导、写作的训练、研究思路的交流，以及在研究实践中的带教——如何在各种对比中活用数据，如何从历史源流中挖掘资料和数据背后的意义及价值，如何处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关系，等等。总之，培养学生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方法，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最终目标则是培养有灵魂、有思想的优秀人才。

我最近刚好接受了一个访谈，总结了我个人指导学生过程中的三点体会：

第一，敢为人先，也就是勇于创新。比如刚才说到的理论化的实证研究，我在国内率先带领学生开展了这样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助于学生养成一种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品格。

第二，以身示范，即不能只是教学生怎么做，而是作为导师自己先做起来。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比如要求学生严谨踏实、胸怀宽广、是非分明，那么，我自己在这些方面都要树立起榜样来。

第三，甘为人梯。事业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的，我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在纪念中国传播学引入30年之际，我在一个访谈里就提及要多为年轻人提供机会，当时我50多岁。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传播学核心作者的高被引论文中，我的论文里大约有一半作品的第一作者是学生。这一现象不多见，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我有意识地让学生尽快地成长起来。回想起来，在很多时候，我作为导师和项目负责人，对研究思路和计划实施负有主要责任，很多论文都是我最后改定的，但我并没有将这些成果都署名自己为第一作者。因为从长远考虑，学生要发展，要让他们成长，如果他们始终没有机会署名第一作者，怎么成长呢？从结果看，确实不错，他们发展得又快又好。粗略统计，在我的学生里，目前有26位教授，18位副教授，5位院长，1位长江学者，3位青年长江学者，1位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李耘耕：您曾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副院长，后来又转到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2017年更名为媒体与传播学院）做院长，请您谈谈对传播学院和学科建设的经验。另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任教经历是否对您的学科发展理念有启发？

张国良：对，在港中大有很多收获，除了感受“公正”的理念和实践之外，还有一个体会是“效率”。他们只有十来位老师，但综合素质很高，各有研究特色，而且，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在实务课程方面聘请了五六十个兼职老师来任教，效率很高。当然，效率还意味着通过大体公正的制度设计把内耗降到最低，把行政事务减到最少，这些都是与国际接轨的先进举措。我在交大担任院长期间，虚心学习并结合国情落实了这一高效、良治的学院文化。

当年交大聘我为院长时给予了特聘教授的待遇，享受一年10万元的岗位

津贴。我想,整个学院的经济并不富裕,我就不参与年终绩效的分配了,尽管我的教学科研成果不少,在年终考核时也名列前茅,能换算成可观的酬金,但我决定只领受奖状而分文不取酬金。这就让广大教工相信我来当院长不是为了谋私利,而确实是为了带着大家一起创造美好的前程。总之,公正不能只说空话,而必须践行,必须落实到制度上,奖勤罚懒。我们建立了一套大体公正、全面的考核指标体系,而且很灵活,各种贡献都可以互换、替代,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一视同仁,每个人的奖惩标准都是一样的,任何人没有特权。这样一来,就前所未有的、充分地释放了生产力。我们学院后来申请到19个国家重大项目,优良文化的激励作用可见一斑。

孟筱筱:现在很多年轻学者面临压力,主要是制度性的压力、晋升的压力,这一代青年学者和您那一代人的状态不一样了。您如何看待现在青年的状态?您有没有对青年学者成长方面的一些建议?

张国良:我仍然坚持这样一种观点:慢就是快。有时,讨巧的路径看起来快,最终是慢的,这有点像龟兔赛跑。在当下的环境里,确实很难沉下心来,干扰太多,压力太大,但年轻人还是要耐得住寂寞。我对年轻人有四点建议,最好从读学术硕士就开始,等做了青年教师再开始就晚了。就是说,立志要早,越早越好,当然前提是这个志不要立错了。这四点建议是:胸有全局、脚踏实地、宽容多元,以及勇于创新。

胸有全局就是说,无论做什么研究都要对大势有了解和把握,大势不单指学科,还包括对世界和中国大势的认识。人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才能不糊里糊涂地活着,才能不成为井底之蛙。有抱负的年轻人一定要胸有全局。对学术也是这样,不管做什么研究都能跳出来看到更大的世界。胸有全局才比较有希望做出大的成就。

脚踏实地就是说不能好高骛远,任何大的成就都是一点一滴做起来的,首先要有一个计划,然后一步一步去实行。当然,必须与时俱进,可能过去的计划随着形势变化需要有所更改,那就及时调整,但大的方向最好不轻易变。总之,脚踏实地非常重要,没有一步一个脚印的精神,志向再高也难有大的作为。

宽容多元不仅指理论和方法的多样,还包括胸怀。不要看得别人成功,别人成功要为他高兴。当然,你可以不服气,但千万不要去害别人,妒忌别人。你最好把他作为你的榜样或激励你前进的动力,只有宽容多元才能更有利于你的成长。

勇于创新。学术的根本目标不就是创新吗?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而要有自己的创新。但如何真正地理解创新的含义?不是你拍拍脑袋就能创新了,你可以提出新的概念、新的词语,但必须有内涵、有张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能

在理论或实际层面发生作用,才有意义。有出息的年轻人要防止杜撰空洞的概念,为了急于求成而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走捷径,图虚名,这也就违背了第二个建议:脚踏实地。

至于如何面对制度性压力,大家或许可以换一个思路。以文字为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做到不朽的。绝大多数人离世后都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好像不曾来过似的,但是,以文字为生的人却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痕迹。当然,前提是你写的东西多多少少有些价值,不断地有人阅读、引用,受到启发。这样,你的文字、思想就得到了长久甚至永久的留存。这是不是可以给各位带来些许安慰?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Guoliang Zhang, ICA Fisher Award Recipient

Guoliang Zhang¹, Xiaoxiao Meng², Yungeng Li¹

(1.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Tongji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communication studies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1980s, the field has evolved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s profoundly transformed the landscap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s a key pioneer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ofessor Guoliang Zhang shares his insights into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intelligent media era. The interview begins with his personal journey and the trajectory of the discipline,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He reflects on the field's growth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examining the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ing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sharing his experiences in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 conversation also emphasizes the influenc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ddressing key topics such a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meta-questions. This interview provides both a retrospective and a forward-looking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as it advances toward an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